



The Appearance of Pre-Qin Diplomatic Languag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Article Studies

Hu Dalei

Abstract: *Ciling* or *Ciming* referred to appropriate verbal response by emissaries on diplomatic occasion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Such verbal response was produced mainly in four different ways. First, the emissaries received both the order and text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he court had officials who wrote the diplomatic texts. These officials were either working under a chairing official or working after being appointed by the court. The example for the latter was the State of Zheng under Zichan, in which the court chose by ability those who wrote diplomatic texts. Another example was the State of Chu, where there was a man named Guan Yifu, who was regard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because of his good skills of writing diplomatic texts. Second, the emissaries received the court order, but not the text. In this situation, the emissaries had to respond immediat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rt and the nation. As a result, they became the writers of the diplomatic texts. Confucius once criticized some emissaries for being sent to many states without being able to make immediate and flexible response on diplomatic occasions. Third, an individual's success in speech resulted from reading the mind of the superior. Scholars of the Spring-and-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ravelled from state to state in search of opportunities to be appointed positions of officialdom. They succeeded by relying on their rhetorical skills to impress the monarchs. Such skills partly had to do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from books and partly had to do with being able to read the mind of the audience and put forth proposals the monarch was willing to accept. A case in point was Su Qin, whose initial failure and later success both had to do with the amount of homework he did in reading and in reading the monarch's mind. Fourth, individuals practiced the writing of the court speech on non-official occasion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ith reading the mind of the monarch was the good preparation of the speech after knowing the target audience. When good speeches led to fame and wealth and reading the mind of the monarch became a popular rhetoric strategy, some people drafted such speeches for scholars to imitate and practice, and they supplied these samples and designed various practice situations and practice responsive speeches. These people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events concerning the texts and speeches. They only provided ideas and materials to help scholars respond on various occasions. These ideas and materials can be seen as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sense. From the four ways by which rhetorical texts were generated, it is clear that the writing of ancient Chinese articles went through stages of evolution, from collective writing to individual writing, from formulaic to practical, from emphasis on self-expression to that on persuasion of the audience, and from practical expression to literary expression.

Keywords: emissaries, diplomatic language, rhetoric, reading the mind

Author: Hu Dalei received his BA in literature from Ningxia University in 1982. He joined the faculty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he received his MA in literature there in 1985. In 1996, he received his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Hebei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 vice chair of the Chinese Anthology Studies Society, and chair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Societ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His research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literature of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terary theory, and stylistic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Medieval Writers Group*, *Research on Poems in Anthologies*, *Poet, Style and Criticism*, *The Evolution of Lyrical Way of Poets in the Medieval Age*, and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Yutaixinyong*.



先秦外交“辭令”的出現及其文章學意義

胡大雷



[摘要] “辭令”，或稱“辭命”，先秦時多指外交場合中行人、使者得體的應對之辭。先秦時期“辭令”的生成、出現主要有四種方式：第一是“受命受辭”，即使者接受朝廷的命令又接受朝廷所頒發的“辭令”。朝廷有“辭令”撰作的專門官員，或由“令正”之官主持，或由朝廷組織衆人所成，如鄭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的組織撰作；楚國則有觀射父能作“辭令”而被稱為國寶。第二是“飾詞專對”，使者“受命，不受辭”。即使者接受君王之命但又沒有接受到君王下達的文辭，在文辭不預設的情況下，需要隨機應答，祇要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就行。於是，使者也就成了文章撰作者。所以孔子批評

某些人“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第三是個人騰說靠“揣摩”而生成。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遠赴他國，以求被用，依靠文辭遊說他國君王。這些遊說文辭的產生，既靠讀書的知識儲備，又要靠“揣摩”對方心思，以提出君王能夠接受的意見。蘇秦起初的失敗與後來的成功，都與讀書、“揣摩”得夠不夠有關。第四是社會力量的虛擬文辭。“揣摩”的根本，就是在確定接受對象情況下的文辭準備，以便“騰說以取富貴”。當揣摩以成文辭形成風氣，就有人代擬“揣摩”成辭以供遊士學習與練習。社會力量為“辭令”寫得好一點而提供資料，虛擬場景，虛擬應對“辭令”。這些人員本與文辭所涉及的事件沒有關係，祇是虛擬應對“辭令”，提供如何準備文辭的思路或直接提供“辭令”資料罷了。如此虛擬的“辭令”，就應該是現代意義的文學了。由“辭令”的四種生成、出現方式可知，中國古代文辭、文章的撰作，走的是一條由集體到個人、從套語到符合實用、從重在表達自己到重在對方接受、從實用到文章與文學的演進路徑。

[關鍵詞] 行人 外交辭令 飾詞專對 揣摩

[作者簡介] 胡大雷，1982年在寧夏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在廣西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96年在河北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廣西師範大學/廣西桂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選學研究會副會長、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國文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漢魏六朝文學、文論、文體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古文人集團》《文選詩研究》《詩人·文體·批評》《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玉臺新詠〉編纂研究》等。

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說：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

這裏講的“行人”、縱橫家的“辭命”也稱“辭令”，指的是他們應對時的文辭。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些應對之辭多表現在外交辭令上，故朱自清說，春秋戰國時代的“論‘辭’是論外交辭令或行政法令”^①；而縱橫家的應對之辭，也多是對他國君主的遊說。本文擬討論“辭令”/“辭命”這類應對之辭的生成、出現途徑，以探討具有共性的古代文辭的文章學意義。

“辭令”的生成之一：“受辭”與成於衆手

“行人”是先秦時期掌管朝覲聘問的官員，也是“使者”的通稱。由於“行人”聘問的職責是以文辭與對方打交道，因此，他們的說辭關係着國家利益。在春秋戰國時期，行人之官的應對之辭有時要借助賦詩進行，如果沒有這樣的能力，那是要受到嗤笑的。據《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前546）載，齊國的慶封聘魯，叔孫“為賦《相鼠》，亦不知也”。這是為慶封第二年逃亡而張本。又，《左傳》昭公十二年（前530）載：宋華定聘魯，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這是無知與失禮的表現，於是，魯國的叔孫昭子說：此人必亡。所以，《論語·為政》記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當然，“行人”更重要的還是具體文辭的表達。《周禮·秋官·大行人》中談到對“行人”語言能力的培養：“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因為，諸侯之間的關係，全依賴“辭命”聯繫，“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②。《左傳》昭公元年（前541）載，長期擔任“行人”一職的鄭國外交家子羽，曾對參加此年諸侯盟會的諸國行人的言辭有所評價。他認為，魯國的叔孫穆子“絞而婉”——言辭恰切而委婉，宋國的左師“簡有禮”——無所臧否而有禮，晉國的樂王鮒“字而敬”——自愛而恭敬，鄭國的子皮、蔡國的子家“持之”——說話得體，並稱他們“皆保世之主也”——可以保持子孫數世的爵位；又評價齊國子“代人憂”——是替人憂慮，陳公子招“樂憂”——以憂為樂，衛齊子“雖憂弗害”——雖然憂慮卻不以為害，並稱此三國皆有“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此三國必惹憂招禍；最後，他做結論說：這就是“言以知物”，即察言而知將要發生之事。也就是由行人、使者的文辭，可知其國家的命運。

在多數情況下，行人出使前是“受辭”而行的。所謂“受辭”，即接受了君主的文辭而出使的。《管子·形勢》言：“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房玄齡註：“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③“行人”是揣着準備好的文辭去辦理外交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④，可謂“受命受辭”。這些“受辭”之“辭”即外交“辭令”，則是由專人起草的。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前547）載：楚國囚禁鄭國印堇父獻給秦國，鄭人以財貨去贖印堇父，臨行前，子大叔寫了贖詞請示子產，子產看後說：這樣寫肯定不能贖回印堇父，因為“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即秦國接受了楚國的獻俘，又從鄭國處貪求財貨，有失國家體統，秦國不會認同。應該寫：“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即感謝秦國相助鄭國，沒有秦國的恩惠，恐怕楚軍仍兵臨鄭國城下。子大叔不聽，把贖詞送了出去，結果“秦人不予”；於是，鄭國重派使者執貨幣前往，改用子產之辭，“而後獲之”。子大叔是專門起草文告辭令之官，官名“令正”，杜預註：“主作辭令之正。”《國語·楚語下》王孫圉

① 朱自清：“詩言志辨序”，《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6冊，第129頁。

② [三國魏]劉劭：《人物志·流業》（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第51頁。

③ [唐]房玄齡註、[明]劉績補註、劉曉藝校點：《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5—6頁。

④ 《春秋穀梁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427頁。

論“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所謂“訓辭”，韋昭註：“言以訓辭交結諸侯。”所以，下文說：“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①觀射父是楚國“能作訓辭”者。

從先秦文獻的記載看，外交辭令多是由集體產生的。前述鄭國的子大叔寫了贖詞請示子產也反映出，外交辭令並非一人所能決定的。例如，《左傳》莊公十一年（前683）載：宋國大水，諸侯有所慰問，宋閔公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魯臧文仲稱讚其話說得好：“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於是得出結論：“宋其興乎。”後來有人說，宋閔公這番話本是公子御說教給的，但公子御說提出的文辭一定要經過宋閔公的同意，這雖然與行人的“受辭”不一樣，但可以說，此番文辭是出於此二人之手。

又如，《國語·魯語上》載：魯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齊孝公伐魯，臧文仲請展禽準備文辭以告謝齊國。展禽說：如果國家政策不定，“辭其何益？”臧文仲說：“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魯僖公“使展喜犒師”，欲使其退兵；並“使受命於展禽”，讓展喜向展禽請教犒勞齊師的辭令。齊侯還未入境，展喜去迎接，齊侯曰：“魯人恐乎？”展喜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展喜對曰：我們依恃的是先王之命。以前魯之始祖周公與齊之始祖太公望輔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勞他們讓他們訂立盟約：“世世子孫，無相害也。”盟約保存在盟府，由大師保管。因此，你們的齊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到了君王您即位後，諸侯都說：您一定能繼承桓公的功業。所以我們就不敢聚衆防守，大家說：難道即位纔九年時間，就會廢棄了先王的政策，那怎麼向先王交待呢？認爲您必然不會來攻打，所以我們“恃此以不恐”。於是，齊孝公撤兵。顯然，展喜取得成效的這番話，是事先準備好的；一是展禽接受了臧文仲的指令準備文辭，二是展喜接受了魯僖公的指令去請教展禽，三是展禽面授，如此輾轉，可以說展喜的文辭並非自己所作，而是出於衆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前542）非常明確記載了衆人準備外交辭令的情況：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諸侯之事”的外交辭令，就是這樣一步步產生的，最後交給子大叔以實施。至於《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叔向稱讚“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稱讚子產的外交辭令說得好，那是因爲有一幫人爲子產準備的。這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的寫作班子，爲了國家利益當然要把文辭準備得好一點。

“辭令”的生成之二：飾詞專對

作爲使者的“行人”文辭的生成，還有所謂“飾詞專對”一途，即藻飾言辭的隨機應答。他們能說出這樣文辭的前提是：“受命，不受辭。”即接受君王之命，但又沒有接到君王下達的文辭，於是纔有藻飾言辭的隨機應答。《春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前675）說：“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何休註：“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理由就是：“出竟（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也就是說，接受君王之命而出境辦理外交事務，祇要有利於國家社稷，說什麼文辭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即“專”，而“飾詞專對”就是一種完成任務的表

^① 胡文波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390頁。

現。所以，孔子稱“誦《詩》三百”而“使於四方”而“專對”之用，何晏集解曰：“專，猶獨也。”^①《史通·內篇·言語》也說：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

《漢書·王吉傳》也有：“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唐人顏師古註：“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②“飾詞專對”的文辭，就是使者獨自所出的。

外交辭令本身，往往也需要“飾詞專對”。唐代孔穎達在解釋“君子九能”之“使能造命”時說：“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③並列舉了著名“飾詞專對”的例子，具體如下：

一是屈完的“飾詞專對”。《左傳》僖公四年(前656)載，楚國使者屈完去齊國談判，“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在炫耀武力的同時說道：“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而屈完回答說：“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④針對齊侯以武力威脅，屈完提出齊應該以德服人，不然，楚就奉陪作戰到底；於是，齊、楚訂立盟約。

二是國佐的“飾詞專對”。《春秋公羊傳》成公二年(前589)載，齊敗於晉、魯、衛聯軍後的外交談判：晉卻克對來談判的齊使國佐說：“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回答說：前兩項我國可以答應；但讓農人把壟畝改成東西向，把齊國的田地變成晉國的田地走向，這個做不到；蕭同姪女是齊君的母親，齊君的母親就如同晉君的母親，讓她做人質，這個更做不到。如果你不同意講和，那麼齊國“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於是作揖要離開。晉卻克示意魯、衛使者，讓他們同意齊國的話而替齊國求情，然後就同意了停戰講和，到袁婁訂立盟約。何休稱讚國佐曰：“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⑤由於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使得四國訂立盟約而重獲和平。

又如，《左傳》僖公十三年(前647)載：齊侯派仲孫湫聘於周，讓他講一講逃到齊國的王子帶的事，請周襄王召他回去。但仲孫湫辦完外交事務，卻未與周襄王說這件事，回國後覆命說：“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⑥意思是，不能說王子帶的事，因爲周襄王還有怒氣，這大概要十年吧！

再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前637)載：秦穆公宴請晉公子重耳，重耳讓子犯隨從，子犯說：“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此處的“文”，應該就是隨機應變的文辭之“文”。去了之後，重耳賦《河水》以表達對秦國的尊敬，秦穆公賦《六月》，以重耳比尹吉甫，預示他必能返國，並擔當輔佐天子的重任。趙衰馬上說：“重耳拜賜。”於是，重耳退到階下稽首，穆公也下階一級表示不敢接受。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⑦子犯之所以推薦趙衰跟隨重耳去會見秦穆公，就是因爲趙衰的言語之“文”、善外交辭令能夠應付各種場面。

先秦時期的職官多爲“家業世世相傳”，《莊子·天下》言：“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職官的職務要求，其執行舊法、舊例，其職務撰作形成學術的專門化，其思想

① 《論語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2507頁上。

②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3066—3067頁。

③ 《毛詩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316頁中。

④⑥⑦ 《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793頁上、1802—1803頁、1816頁上中。

⑤ 《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2290—2291頁上。

發揮、意見表達是從屬於專業職事的記錄與敘說的。《荀子·榮辱》言：“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職官所從事的“筆書以爲文”是職業撰作，其內容與形式是有明確規定性的，可以“不知其義”，但必須“謹守其數”。到春秋戰國，提倡外交可以“飾詞專對”，也就是允許自主性的文辭撰作了。

“辭令”的生成之三：“讀書”與“揣摩”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遠赴他國，以求被用，其仰仗的技能是遊說——靠辭令遊說君王。劉知幾《史通·言語》還說：“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但此處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所謂“馳說”“劇談”“利口”之類辭令，事先是要有準備的。例如，公孫鞅在遊說秦孝公之前，“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但秦孝公到底想聽點什麼，公孫鞅心中並沒有底。於是，公孫鞅先“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又“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最後“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他試了幾次，最終“說公以霸道”纔成功了。公孫鞅所說的“帝道”“王道”“霸道”辭令，是其知識儲備，是其學習而得；但他沒有能夠揣摩到秦孝公的心思，第一次“說公以王道”就沒談攏，秦孝公對介紹人景監發怒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①幸虧景監力薦，纔有第二次、第三次。因此說，公孫鞅雖然是成功了，但由於未能揣摩到秦孝公的心思，起先風險很大。數代後，范雎的辭令就是另一種情況了。《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范雎就揣摩到秦昭王對大權旁落的鬱悶，故意這樣說而“欲以感怒昭王”，於是，秦昭王踞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正是范雎揣摩到秦昭王的心思，就被重用。

又有蘇秦遊說的事例。《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出遊數歲”，但各國君王不愛聽，其所談不得要領，“大困而歸”。於是“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這是爲以後的遊說辭令做準備，“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戰國策·秦策一》亦載：“（蘇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②蘇秦“遍觀”群書的重點是《太公陰符》， “揣摩”出可以“說當世之君”的辭令，這應該是有的放矢的準備，即章學誠所說的“抵掌揣摩”，這是把其準備辭令的過程概括爲以“揣摩”爲要點。

揣摩，意即揣度對方，以相比合。戰國時的遊說術，就是揣度國君心思，預先準備好遊說辭令，使遊說投合其本心。商鞅與蘇秦，起初都是“揣摩”不夠，纔令第一次遊說沒有成功。故“揣摩”是實施“縱橫之術”的必要前提，王充就說：張儀、蘇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③。這是說，遊說是要事先揣摩、準備好辭令的。《隋書·經籍志三》說：“從（縱）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所謂“明辯說，善辭令”，就是要事先揣摩、準備好能夠迎合君王心意的辭令，以求遊說一舉成功。所以，“揣摩”可視爲應對之辭生成的又一方式。辭令生成的重點，不在於自己要表達什麼，而在於對方想聽什麼，如此纔能成功。

“揣摩”以求迎合君王心意的辭令，是需要有廣泛知識儲備的。例如，甘茂，“事下蔡史

①〔漢〕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2228頁。

②〔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85頁。

③〔漢〕王充《論衡·答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81頁。

舉先生，學百家之術。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莊。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①。甘茂從所“學百家之術”中提取某些能夠迎合秦王的辭令，這樣纔能成功。因此，所謂“讀書遊說”，說盡了縱橫家活動的整個過程——遊說需要準備迎合君王的辭令，而準備辭令就需要學習。《說苑·建本》載，寧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通過十三年的苦學，被周威王師之。寧越是如何“學”呢？不外乎求師、讀書而已。而史稱蘇秦、張儀都曾追隨鬼谷子學習與讀書，“揣摩”的前提是隨師學習與“讀書”。

因此，在春秋戰國時期，“明辯說，善辭令”的背後，關鍵在於能夠“揣摩”出迎合君王心思的辭令。然而，也有反面的例子，如孟子，所謂“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但是“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②由於其所準備的辭令與君王心意不符，所以他不能成功。當然，他是不願意去迎合君王的，而是想用自己的遊說去改變君王。

“辭令”的生成之四：社會力量的虛擬與提供資料

“揣摩”的根本，就是在確定接受對象的情況下，做好辭令準備，以便“騰說以取富貴”；揣摩以成辭令，一時形成風氣。於是，就有了代為設想遊說時會出現的各種情況，替遊說者代為“揣摩”而成辭令，這就是《戰國策》中部分辭令出現的原因。《戰國策》一部分是歷史經驗，一部分則是代擬“揣摩”成辭以供遊士學習與練習的，正如楊寬所說：“縱橫家講究‘揣摩’……揣摩情摩意確是縱橫家十分注意的。所有這些戰國權變和遊說故事的彙編，原是遊說之士的學習資料，或者是練習遊說用的腳本。”^③繆文遠稱，《戰國策》之文，“或純為遊士練習模擬之作”；他評論《戰國策·齊策三》“楚王死”章：“此章勝意疊出，奇變無窮，然按之於史實則皆虛，蓋為治長短術者為其徒屬揣摩示範之談。”^④其他還有替“長短術”“縱橫之術”學習者的“揣摩”提供資料者，如《韓非子·說林》，王先慎引《索隱》點題：“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陳奇猷評論道：“此蓋韓非搜集之史料備著書及遊說之用。”^⑤又有《韓非子·難一》，舊註：“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⑥這應該是為“揣摩”者提供反面的資料。

社會上的人員為辭令能打動人而提供資料，這些人員本來是與辭令所涉及的事件沒有關係的，祇不過是提供如何準備的思路或提供資料罷了，遊說者則從中獲得好處。例如，前述《戰國策》“楚王死”章，雖然祇是虛擬的場景、誇張的辭令，但其合理的效果顯示出，社會提供的“揣摩”之談應該是有效的。所以，“楚王死”章文末有“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稱可以這樣去遊說薛公，達到了“以善蘇秦”的效果。又如，《韓詩外傳》卷十第八章虛擬了這樣一件事：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管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管潰失。臣欲亡去，為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管在此，願以將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

然後評價說：“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

① [漢]司馬遷：《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第2310—2311頁。

② [漢]司馬遷：《史記·孟軻荀卿列傳》，第2343頁。

③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672—673頁。

④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7），第2、353頁。

⑤⑥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17、792頁。

矣，民之莫矣。’”這就是強調如何“矜文辭”：一是表現自己無私的“喻誠信”，既不願“兩君之使不通”，又不願讓君王承擔“賤士貴鴻”的惡名；二是“欲拔劍而死”表示自己的氣概；三是達到了“解結申屈”的目的。正是這樣的“矜文辭”令辭令言說者也獲得了最大利益。而之所以虛擬這樣一件事及其應對辭令，就是說明“矜文辭”的作用，也證明“矜文辭”是要依靠社會力量來提供的。

於是，人們知道，《文心雕龍·論說》所稱這些辯士的文辭威力以及獲得的利益：“轉丸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應該就有其學習“揣摩示範之談”的原因在內。

社會提供給辯士如此的虛擬遊說辭令以供其學習，提供給辯士如此的虛擬故事以供其參考，表明社會對文辭撰作的極大重視；而這樣的遊說辭令、這樣的故事的出現，也可以說是純文學的形成了——事件是虛構的但又不離現實，語言上是誇張的但又充分合理，這不就是純文學嗎！

餘論：外交辭令出現後的文章學意義

以外交辭令為主要內容的應對文辭，與行政法令不一樣之處是，行政法令之類有職業化、格式化的套語，如誄文、賀文、吊文等公事化公文，包括大祝六辭、尚書六體等，而外交辭令除了往來禮儀、禮節之類的職業化、格式化套語外，更多的是為應付、解決現實問題而發。外交辭令，從賦詩言志的借現成的詩句表達自己的意思，到由專門文辭的表達，這已是語辭表達上的進步。這些“辭命”/“辭令”的生成，由群策群力的成於衆手，到個人隨機應變的“飾詞專對”，再到個人的事先“抵掌揣摩”以有的放矢，再到供辯士們學習與取用的虛擬遊說文辭資料的出現，此四種生成、出現方式，對後人理解中國古代文辭、文章的生成，有着豐富的意義。

一是這些應對之辭的生成和出現顯示了辭令撰作由集體到個人、由王官職官的職務撰作到個人騰說的進程。二是辭令的撰作是如何從重在表達自己，一步步到重在對方接受的；於是，引發撰作的出發點從命令、告知接受者，到說服、欣悅接受者的轉變。三是虛擬遊說場景與遊說文辭以輔導應對之辭的生成出現，表明社會對文辭撰作的重視，人們也可以依靠社會力量來進行文辭撰作，文辭撰作一步步實現普及化。四是虛擬遊說場景與遊說文辭，顯示了純文學的發生進程。

以外交辭令為主的應對之辭的生成、出現，對其他文辭的生成、出現也有着某種示範作用，《論語·憲問》曾泛化而言前述子產召集衆人討論生成“應對賓客”之辭：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即教令、政令、王命、朝命；而“為命”應該就是起草這些朝廷文件。孔子這裏是把子產諸人撰作外交辭令泛言“為命”的文辭撰作。因此，討論某些專門文辭的生成過程，是討論中國古代文辭、文章、文學生成出現的必要路徑之一。